

乔龙德 著

ADJUSTMENT OF OWNERSHIP STRUCTURE

所有制结构

调整与

非国有经济发展

DEVELOPMENT OF NON-STATD ECONOMY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乔龙德 著

ADJUSTMENT OF OWNERSHIP STRUCTURE

所有制结构 调整与 非国有经济发展

DEVELOPMENT OF NON-STATD ECONOMY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所有制结构调整与非国有经济发展/乔龙德著.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1

ISBN 7-5352-3490-9

I. 所… II. 乔… III. 所有制-经济体制改革-影响-非国有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353 号

所有制结构调整与非国有经济发展

©乔龙德 著

责任编辑:曾凡亮

封面设计:喻 杨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电话:87679468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12-13 层

邮编:430070

印 刷:孝感日报印刷厂

邮编:432000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 5.625 印张 126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52-3490-9/F·449

定价: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找承印厂更换

序 言

乔龙德同志长期从事经济管理的领导工作,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撰写的《所有制结构调整与非国有经济发展》一文,是长期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获得的研究成果。该文采用大量的数据,用科学的方法,对所有制的概念、存在的形式、结构变化的合理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深刻的阐述。文中提出的,所有制理论在我国的发展是人们对生产力规律认识的必然结果;所有制结构适时适度调整将促进生产力发展;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在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统一的,因而它们完全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互为条件、和谐发展。文中的观点正确,论述也是充分的。

文章指出,所有制是形式,是手段,不是目的,它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判断其合理程度的关键是适应程度,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所有制结构在与不同的生产力相适应的过程中,还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条件相结合,所有制是可变的。所有制比例随着经济发展必然会减少国有经济,增加非国有经济,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所有制结构合理程度将决定经济效率的提高,我国的快速发展不仅仅是所有制多元化的结果,而是适时地、有效地调整了所有制结构。上述的阐述与分析,符合我国所有制理论演变与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实践。该文对理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认识产权制度都很有帮助。

冯之浚

(冯之浚为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目 录

第一章 所有制理论研究的背景与理论综述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理论综述	4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15
第二章 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18
第一节 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18
第二节 所有制结构变动与经济运行效率	46
第三章 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贡献	54
第一节 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54
第二节 非国有经济发展对财政收入的贡献	58
第三节 非国有经济对社会就业的贡献	63
第四节 非国有经济对结构调整的贡献	67
第五节 非国有经济对市场化进程的贡献	70
第四章 非国有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74
第一节 非国有经济发展中的自身问题	74
第二节 非国有经济发展面临的市场条件问题	80
第三节 非国有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市场准入问题	99
第四节 一些非国有经济以非正常市场行为对国有经济侵蚀	108
第五章 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加快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120
第一节 建立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	121
第二节 完善市场竞争的体制	126

2 所有制结构调整与非国有经济发展

第三节	拓宽信贷融资渠道·····	131
第四节	健全政府和社会的服务功能·····	137
第六章	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展望·····	143
第一节	参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新生力量·····	143
第二节	构造适应市场经济的重要微观基础·····	148
第三节	支撑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	151
第四节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基本力量·····	154
第七章	全文总结与研究展望·····	159
第一节	全文总结·····	159
第二节	研究展望·····	160
参考文献	·····	162

第一章

所有制理论研究的背景与理论综述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近 20 年来,在世界经济领域发生的经济体制变革,其基本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在这方面,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如:原实行计划经济后推行私有化改革的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有经济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而中国则首先以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为主要内容,对国有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和战略布局调整,实行多元化改革。这些不同的改革途径最终都有一个相似的结果,即以非国有经济比例上升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的改变(虽然最终各国的所有制结构并不相同)。非国有经济比重之所以上升,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比国有经济更富有效率。正因为如此,众多国家的经济改革演变成简单的私有化运动。但是,由于国有经济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比如,诸多的社会职能,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等等),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实际上是各种经济结构比例的优化选择过程,而这一优化选择过程必须服从于选择的目标,那就是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和谐发展。

在我国有两种方法论在解释中国的所有制改革,一种是西方

传入我国的产权理论,另一种就是建立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上的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目前这两种理论的解释都有各自的体系。

进入 90 年代,西方产权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我国众多经济学家为产权理论对所有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解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于产权理论在中国的适用问题提出质疑的众多观点,其背景是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以私有化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即“休克疗法”所导致的这些国家几乎都面临了工业产出的严重滑坡。相比之下,作为经济转型大国的中国在并没有对国有企业采取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通过非国有企业的高速发展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表现为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和亏损程度加重。虽然政府推出了诸多改革措施,但是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对于这种现象,支持产权理论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国有经济的唯一出路就是彻底的产权改革,甚至就是“私有化是唯一出路”。但是,实践中的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一边倒,而是探索出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同和谐发展的路子。

在中国,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诠释不断推陈出新。在改革开放之前,存在着“所有制”的概念,但还尚未有“所有制结构”的概念。应该说,“所有制结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讨论我国所有制改革问题提出来的,现在已为大家所广泛接受并写进中央文件。到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所有制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党的十六大又作了进一步的创新。主要有如下几点^[1]:

第一,在如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上,提出了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之所以可以

同时坚持这两个“毫不动摇”，是因为两者可以统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之所以需要这两个“毫不动摇”，是因为它们在市场经济中都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迄今为止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按照经济规律所作出的最透彻的阐述。

第二，对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完成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过去的“国有资产分级管理”以及管资产、管人、管事分开来管的体制，很难完全解决所有者到位而不越位以及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等问题。党的十六大指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是探索有效的国有资产经营体制的新成果。

第三，提出了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除了需要进一步解决市场准入和公平待遇之外，还需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我国法律已经在保护私人财产方面作了一些规定，但还不完善，同保护公有财产的规定相比，也有相当差距。在私营企业家中存在着小富即安、不努力扩大经营、怕露富、甚至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的现象。这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都同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有关。所以，宪法修订及党的十六大做出如此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在“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指导下，非公有制经济将有一个大发展，这是无疑的。

现在关于我国国有制与非国有制关系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是非常丰富。以上十六大报告中的论述,就是对以前研究的最好总结。在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各行各业的所有制改革如火如荼,并且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国有制经济与非国有制经济共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目前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有些方面受到国有经济的歧视,它们的竞争不在同一起点上,同时,由于非国有经济产权结构不明晰,没有法律性外部约束,它又对国有资产造成了一定的侵蚀。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促进所有制改革和非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

第二节 理论综述

一、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研究

(一)国内经济学家对于马克思的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的所有制与产权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他本人虽没有专门论述所有制与产权问题的著作,但完全可以说,所有制与产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这一点,也同样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承认和高度评价。佩乔维奇在《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因此,加强对马克思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的研究,不仅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对于指导我国正在进行的所有制与产权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的所有制与产权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马克思是在具体而非一般的意义上来论述所有制和产权问

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与产权关系没有从最一般或最抽象的意义上给所有制和产权下一个定义。马克思研究的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总是在某一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所有制和产权制度,也就是说,马克思总是在特殊而不是一般的意义上来论述这一问题的。至于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是什么样子,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都是仅仅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势而拒绝设计任何细节。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社会的所有制和产权制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们既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环境来空洞地谈论所有制(比如撇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来认识其基本经济制度),更不能想当然地设计所有制(比如所有制问题上的“升级竞赛”)^{[2][3]}。

2. 产权关系是所有制关系(生产关系)的法律形式,它是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产权关系首先表现为经济活动主体对特定的生产条件的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关系是任何生产的前提。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何炼成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强调,生产资料的所有与占有关系,从表象上看来只是人与物的关系,但从本质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即对物的占有来体现的物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则体现为阶级关系。”确实,这是马克思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的突出特色。

3. 所有制与产权是一个随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运动的范畴。随着经济关系的变迁和经济条件的变化,所有制及其产权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着;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也要求不同的产权制度与其相适应。

4. 对所有制及其结构合理与否的判定上的生产力标准观。特定的所有制及其结构作为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特定形式,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的一种自然选择。所以,所

有制本身并不存在先进落后(低级与高级)的区别,只存在是阻碍还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4][5]}。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完全彻底、一贯到底的生产力标准观。当代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6]这条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中的主线,正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脉相承的。

5. 所有权的结构及其分解与组合。马克思具体分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归同一主体行使、所有权主体与经营权主体的彼此分离以及公有制下由同一所有制主体的不同部分来分别行使所有权和经营权这三种两权分离的情况。这些分析对我们今天的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方式的改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6. 公有制是未来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为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和产权制度设计详细方案,这需要后来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予以实事求是地解决。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家在所有制理论上的贡献和发展

在我国,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改革开放的实践的推动,我们在所有制理论上也有一系列突破和进展,主要有:

1. 提出了所有制结构的概念,并对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进行深刻的探讨与肯定。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提出了“所有制结构”这个概念,并且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正因为有了这概念,所以当时就提出了发展个体经济、国有经济可以采取多种经营形式等问题,以及对承包制应予以充分肯定等等。稍后,当在实践中引进外资出现了“三资”企业以及“三来一补”经济、在家庭承包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劳动雇佣关系的私营企

业时,理论界立即加以研究并予以高度评价,同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以及提倡推行股份制等等。这样才逐渐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理论。党的十五大提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和发展,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混合经济和混合所有制概念的形成。这是两个互有联系但内涵有别的概念。“混合经济”指的是我国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它们分工合作,优势互补,才能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与它对立的是单一的公有制,或单一的私有制概念。这一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董辅初提出的,国外也有这一概念,但它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单一的资本主义私营经济。而“混合所有制”指的是相对于基本所有制的另一种类型的所有制,即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基本所有制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所有制企业,例如联合企业、中外合资、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等等。这一概念经过实践的推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肯定了这一概念,这当然是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的发展。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必然要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但是在多种所有制中,由于混合型的所有制具有比单一所有制的诸多优势,可能比单一所有制的发展更好更快。混合所有制的出现,使所有制关系更加复杂、多样,这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是社会和经济文明进步的体现。

3. 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私有并存的论点。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把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当然包括了公有、私有并存的概念。但报告所讲的是初级阶段,而初级阶段结束后怎样呢?于光远在他近年来的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公有、私有并存,将来初级阶段结束后也应当是公有、私有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在保护公有财产的同时,保护私有财产^[7]。十六大的报告和我国宪法修改中已经明

确提出了要保护私有财产。

二、所有制结构与经济运行效率

半个多世纪以前,经济学家们(如 Arthur Lewis, 1949)对国有经济怀着特殊的兴趣,其基本的原因倒不在于国有经济本身运行的效率表现,而在于国有经济在应对当时由垄断和外部性导致的市场缺陷和市场均衡中作用,主张对土地、矿山、通讯、保险,汽车制造业等实行国有化,由此引起的所有制结构因公有经济的发展而变化。与此同时,更多的经济学家则对国有经济的作用持相反的态度。在 20 世纪的 30~40 年代出现了对所有制结构的种种争议,争论从公有经济的比例开始扩展到了更为宽广的领域,诸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内计划的地位等。后来,由于国有经济在世界范围出现的经营失利事件逐渐增多,加之所有权和合约理论的发展,使人们开始对私有产权制度产生出了日益浓厚的兴趣。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兴趣,具体有三个原因:

其一,因为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所有制和非国有经济的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内含的效率机制不同。著名的格诺斯曼—摩尔理论(Grossman and Hart 1996, Moore, 1990)认为,财产所有权赋予所有者在无法形成合约或不可合约条件下的控制与讨价还价权力,其结果是,所有权能强化所有者进行降低财产使用成本(提高效率)的投入激励,因为财产的所有者对这样的投入具有收益索取权。在国有企业中,一方面企业的任何效率改进行动需要获得政府的认可,另一面,效率改进后的收益又与行为者无关,这必然导致提高资产运行效率的激励低下。在国有经济里,由于众多经济行为的成本与绩效的定量测定都具有极高的代价,所以对于这个行为过程与环节就无法形成合约。财产的公共所有,使得国有企

业的经理不具有节约使用财产的动力,因为他们不是企业的所有者,只能分享其收益的小部分。所以在合约理论的局限下,私人所有制成为企业创新与效率改进激励创造的关键。这正是萨谬尔森在1948年所说的自由企业制度的巨大活力。上述这一些理论的诞生和发生作用是很多的“产权私有化是赋予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唯一出路”认识(刘苟佳,李骥,1998年)形成的背景。

其二,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公有经济目标的假设客观上不成立。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治家们通常转让公有利益给一定社会阶层,以获得政治支持,这个过程或者以迫使国有企业雇用过多人员,或通过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增加来实现,这个目的性极强的公共财富转移过程引起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这是国有财产制低效率的第二个原因(Shleifer and Vishny,1994;Bennedsen,1998)。

其三,政治家个人利益最大化引发腐败行为发生。腐败发生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经济运行过程中使用公共资源进行贿赂,造成公共财产流失,另一方面发生在公有经济的私有化过程中。政治家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强力干预公有财产转让对象的确定、公有财产的价值估算和定价以及转让过程中合约协议的产生^[8]等,这些过程都会直接引起公有制经济的低效率。

在中国,所有制结构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效率差别;同一所有制性质企业(比如国有企业)的效率差异;所有制经济结构不同的效率差别。

刘小玄应用 Data Envelopment 方法分析了中国1986~1990年间所有制结构与效率的贡献,指出:乡镇企业的技术效率在研究期间远高于国有企业,同时乡镇企业的效率也高于城市集体企业。三者之间,最富效率的是乡镇企业,效率最低的是国有企业^[9]。

姚洋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不同所有制构成的技术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与国有企业比较,集体企业的技术效率高22%,私营企业高57%,国外三资企业高39%,港澳台三资企业高

33%。这说明在所有制构成中,企业技术效率的高低排序为民营企业、国外三资企业、港澳台三资企业、集体企业、国有企业,从而进一步确认了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结论^[10]。

刘伟(2002)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所有制结构对经济规模和要素生产力的影响模型,对1993~200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①所有制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影响经济的生产规模;而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主要是影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②在中国经济中,当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人员超过53%时,经济会进入规模经济增长的良性增长状态。

在分析所有制结构效率过程中,另一重要的方面也值得重视,即国有经济本身效率的变动趋势,也就是说,在经过多年的改革之后,通过国有经济内部一系列经济关系的调整,是否给国有经济带来了效率,这不仅可以研究国有经济本身的效率问题,而且还是对改革措施效果的客观评价。孔翔,Robert E. Mads 与万广华(1999年)对国有经济进行行业研究,将建材、化工、机械、纺织作为研究对象,得出结论为1994~1998年间,建材行业平均技术效率水平(TE)为0.687,化工行业为0.415,机械行业为0.437、纺织行业0.757。我们似乎应该以另一角度来认识国有经济,也就是,这样的经济形态的内在固有机制决定了其效率表现,在这一立论之后,提高国有经济效率就必须突破其内部的固有机制,这就得依赖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不同所有制成分具有不同产权结构以及组织制度,正是这两者能成为不同所有制效率差异的解释原因(刘小玄,2000、2003年)。不同的所有制构成具有不同的产权结构,包括所有权、财产处置权、剩余支配权等结构安排。产权结构的差异导致激励机制的差别,产生不同的激励效果,表现为不同的效率水平^[11]。

三、产权改革与所有制结构调整

中国目前的变革称为经济转型,即从计划经济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的研究越来越支持产权改革能够促进所有制改革这一判断。实践中,在东欧各经济转型国家,产权改革确实被作为推动所有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失业率的上升以及国有企业存量的显著下降。在那些并没有实施产权改革的国有企业中,经营者对企业的改革也往往导致企业对员工的裁减,这促使资源向私营经济流动。客观上起到了对私营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此外由于传统计划体制下一部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状况并没有得到迅速扭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非国有经济往往凭借其更强的市场竞争能力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12]。由此我们在各转型国家普遍观察到的一个事实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即国有比重的下降或非国有比重的上升。

这种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是转型国家经济重构在宏观层面上的一种表现,对其研究需要结合动态过程加以考察。那么我们指出的产权改革、资源流动、失业率上升等因素怎么样对所有制结构调整产生作用呢?

早期国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提出对计划经济国家采取迅速和完全的私有化的政策主张时显然忽视了以上问题的重要性,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各项改革措施同步一致的重要性被过于强调,所以就必然倾向于“大爆炸式”的改革措施。

但是,如果将政治上的可能性(如迅速而彻底的产权改革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考虑在内,渐进而有步骤的转型方式确使改革易于开始并且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让原本难以推进的改革被逐渐接受^[13]。例如,企业的重组会导致对职工的解雇甚至是部分亏损企业的破产,这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受到职工的抵制,但是通过先发展